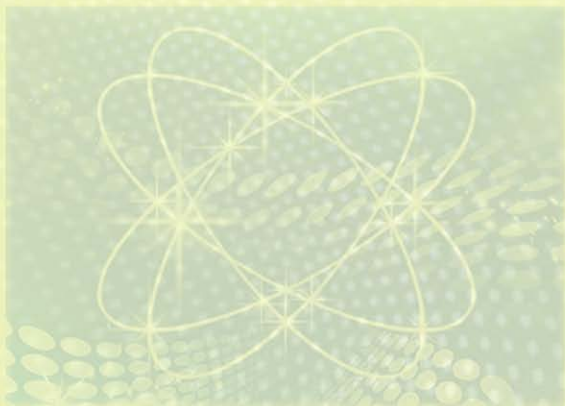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研究


王琦 龙迪勇 主编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研究

王琦 龙迪勇 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研究 / 王琦, 龙迪勇著. —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90-4655-6

I. ①上… II. ①王… ②龙… III. ①歌词-文学研究-
上海市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925 号

国际互联网(Internet)地址:

http://www.jxkjcs.com

选题序号:ZK2012161

图书代码:B12038-101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研究

王琦 龙迪勇 著

出版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南昌市蓼洲街 2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9 电话:(0791)86623491 86639342(传真)

印刷

南昌市印刷九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5.5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90-4655-6

定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3-2012-15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夜上海,夜上海,你就是个不夜城……”每当这首经典的上海老歌《夜上海》音乐骤起时,我们的思绪都会随着美妙的音符穿越时空来到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上海滩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夜来香》、《四季歌》、《天涯歌女》、《香格里拉》、《长城谣》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上海老歌凭借着婉转动听的旋律、朴实真挚的歌词,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时至今日依然让我们深深为之感动、久久陷入沉思。

上海老歌的创作发端于20年代末,兴盛于30~40年代。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老歌既是现代都市的文化产物,也是都市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上海老歌的歌词文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延续,是启蒙思想的反映,也是新时代的心声,它唱时代之所唱,唱大众之所唱”,它们仿佛是一面反映民情民意民生的镜子,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百姓现实生活的各种主题。通过分析这些上海老歌的歌词文本叙事,我们能够多层面、多维度地窥见那个特殊动荡的年代所独有的都市文化,从而得以从这扇小窗

走近那个时代人的心灵世界,尽可能地体悟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是新旧交替,东西文明交融、碰撞尤为激烈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民众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上海老歌诞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上海老歌的歌词文本叙事中承载了特殊的文化使命:除了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都市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文化意趣以及普遍的人类情感需求,上海老歌还肩负起弘扬社会正气、针砭时弊、鼓舞士气等多种社会功能。

今天,当我们再度聆听这些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的歌曲,细细揣摩和思忖这些歌词文本背后所讲述的或喜乐或哀怨的故事,“它放大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歌,试图去解读一些那个年代的社会现象”。这些上海老歌的歌词文本叙事究竟展示了怎样的世情世貌,如何表征一个时代的兴衰成败,又反映了怎样的民生民怨?对于这些,本书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加以阐发和解读。如能用音符唤起诸君对那个特殊时代的久远记忆,同时对那时代的人、事、物有了更新的认识,则是本书最大的收获。

目 录

第一章 上海老歌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1
第一节 都市生活与乡土情结	3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与本土滋养	12
第三节 现代情感与古典意象	20
第二章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与都市文化	29
第一节 “居于城”与“居于乡”的历史悖论	30
第二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都市文化	32
第三章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内容分析	40
第一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叙述性话语	40
第二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非叙述性话语	42
第四章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模式分析	56
第一节 因果-线性叙事模式	56
第二节 主题-并置叙事模式	58
第三节 环形叙事模式	60

第五章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主题研究	64
第一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爱情主题	65
第二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教化主题	77
第三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乡愁主题	90
第四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生态主题	100
第六章 上海老歌歌词文本叙事中的时间问题研究	118
第一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时间表现形态	119
第二节 歌词文本叙事中的时间运用策略	124
附 录	140

第一章 上海老歌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说起“上海老歌”，人们就会想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因为通常认为它诞生在 1927 年的上海，其标志是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与《落花流水》等几首“爱情”歌曲^①。作为中国流行歌曲“鼻祖”，黎锦晖先生对“上海老歌”的界定是：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亵的词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②。“上海老歌”现在学术界一般把它称之为“海派都市流行歌曲”，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老歌主要诞生于上海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另一方面它抒发的情感、表达的思想具有典型的都市特征。本书中所探讨的“上海老歌”，主要是指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1949 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诞生于上海等大都市并逐渐流行于全国的

^①王勇、鲍静编著：《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 页。

^②黎锦晖：《我与明月社》，《文化史料丛刊》第三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 5 月。

通俗歌曲。这些当时在街头巷尾、为民众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以都市大众为主要受众、以商业化运作为主要营销手段、通过当时的主流媒介渠道如唱机、唱片、电台收音机以及歌舞团、舞厅、有声电影等进行广泛即时的传播,取得了轰动一时的传播效果,“在中国从此出现了一种以往前所未有的新式歌曲传唱的热潮^①”。

近些年来,对上海历史及其海派文化的研究,已引起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兴趣,也产生了不少扎实、厚重的成果。单就海外汉学界来说,“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②无可否认,“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③对海派文化的研究同样如此,不仅海外,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已蔚为大观。尤其是自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影响深远的著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翻译出版以来,对海派文化的研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海派文学、海派电影,还是老上海的新闻出版、学术研究,都被放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作为海派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派都市流行歌曲,却几乎没有进入海内外研究者的视野,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本章即欲对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进行初步探讨,力图勾勒出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基本面貌。

①王勇主编:《海上留声——上海老歌金曲100首》,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上海史研究译丛》“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③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上海史研究译丛》“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节 都市生活与乡土情结

正如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的“中译版序”中所指出的：“现代性一部分显然与都市文化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①事实上，不仅西方，中国的情况亦复如是。要探讨海派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必须到海派都市文化中去寻找；而要探讨海派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我们必须到作为世界大都市的老上海去寻找。作为海派都市文化之一种的海派都市流行歌曲，显然与老上海的都市生活有关。

（一）都市生活与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现代性

“海派”是个历史概念，因为海派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因此，要探讨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现代性，我们必须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上海都市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老上海的都市生活导致了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海派文化的产生，并造成了其现代性品格。

上海自开埠以来，城市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就拿城市人口来说，就呈现出了几何增长的态势。有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县的人口约达 54 万，其中一半居住在县城以及紧邻县城的郊区，余下的一半则分散在县内各个村镇里。县城以北的郊区，也就是后来的外国殖民地，只有大约 500 左右的居民”，“可是五十年之后，这块地区的人口数量暴增至 50 万。再过 50 年，上海的人口数已超过 545 万。换句话说，上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人口数量成十倍地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的高度集中，绝大多数的人

^①(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 页。

不再散居在上海县各村镇，而是集中在原来县城北面的郊区里。这个地方已成为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1930年每平方公里人口达43570人，1935年时已增至50032人，1940年至1942年期间更达到76880人。”^①这么多的人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除了谋生和工作，当然还有休闲和娱乐的需要。海派都市流行歌曲可以让人们在工作之余，在优美、悠扬的旋律中心情得到了放松，所以其产生是符合广大市民的需要，因此是必然的。

上海的城市人口不仅多，而且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不但国内各地都有人在上海居住，像英、美、德、法、意、日、俄等外国人长住上海的也不少。“虽然在大部分年份上海的外籍人士还不到3%，他们却来自世界各地，从流浪汉、妓女、到外交家和暴发户，应有尽有。上海的中国人从某种观念而言也是外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是乡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上海，希望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②正是这种五方杂居的状况，造成了上海的移民文化特征。“一般说来，移民文化总是比较宽容的。文化的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移动，不同国度和不同地区的人带着不同区域的文化走到一起，其结果必然是对异质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以便使自我在整个大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范围内是移民程度最高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异质性很高，呈现出特有的万象杂陈的斑斓色彩。”^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宽容的、开放的、兼收并蓄的心态，所以各种类型的文化在上海都能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①(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页。

②(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③王雪瑛：《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访熊月之》，载《访问迷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如果说,宽容、开放的心态给了海派都市流行歌曲诞生的土壤,那么,商业精神则给它的现代性品格准备了条件。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上海的精神在于由西方带来的商业活力。尽管上海在向西方开放以前已经是繁忙的商业中心,但只是一些诸如棉花贸易之类的传统商业,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促进上海飞速发展的全新的商业动力。”^①是的,这么多的人之所以都往上海涌,说明上海对他们来说有着无穷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则在于全面的商业活动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和发财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生存条件。“经济上的机遇、日常生活上的便利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赐予城市相对于农村无法比拟和难以抗拒的有利条件。”^②欧大卫在当时的《中国观察》上有一篇专门写上海百货公司的文章,从中可看出当时的商业之繁盛:“一般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上海是有些原始的,如果不说半开化的话。这个城市经常性地与手推车、平底船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相联。但令新来者吃惊的是,他们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街、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猎装和BVD内衣陈列在一起,HOUBIGANT香水下面,FLORSHEIM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夸口它是‘环球供货商’”^③看来,上海当时的商业之繁盛,足以和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

①(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②(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③(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大都会媲美。

上海当时商业的繁盛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自然,这种“繁盛”也包括文化。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曾经谈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近海者近商。”^①李天纲亦认为:“‘海派’的生存环境是都会式的。历来把四马路说成是‘海派文化’的集中地,报馆书局书场剧院茶园烟寮妓院,一应俱全。文人作家艺术家及各种爱好者麇集于此,各阶层人也来此消费娱乐。这是一种近代式的文化经营区,带有都市繁华色彩。与江南旧式城市相比,这里的经营普遍大型化。”^②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海派文化的商业精神使它经受了市场的考验,只有那些为普通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才能在时间的淘洗下保存下来。当时的许多流行歌曲都是由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制成唱片发行的,如果人们不喜欢,市场反应不佳,唱片公司必然不会再生产,歌曲也就慢慢地不会再流行下去。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正是在这种商业精神的激励下,海派文化才真正形成了自己民主、开明、宽容的现代性品格。海派都市流行歌曲之所以会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普遍欢迎,跟它具备这种现代性品格是有关系的。

老上海的都市生活催生了海派都市流行歌曲,并赋予它一种现代性品格,而海派都市流行歌曲则反过来反映了这种都市生活。鲁迅说海派文化“近商”,海派都市流行歌曲即有反映“做生意”者诉求的作品,如王人美演唱的《卖饼儿》:“北风吹来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百业无高卑,志当坚,青年有求,怎能偷生于人

^①鲁迅:《京派与海派》,见《且介亭杂文二集》,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李天纲:《“海派”近代市民文化之滥觞》,载《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间。”歌曲正是某种都市生活的写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为都市的文艺创造了良好的自由实现的生态环境和流行市场。自然，在流行歌曲中也有不少生活气息颇浓的活泼的商业歌曲，表现了‘做生意’者的诉求。”^①显然，歌曲中反映的那种百业无高卑、青年当志坚的精神，是一种现代性品格。此类歌曲还有《卖报歌》（聂耳曲、安娥词、龚秋霞唱）、《卖烧饼》（吉士词、曲，周璇演唱）、《卖油条》（许如辉词、曲，江曼莉演唱）等。但反映上海都市生活的流行歌曲很快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如由林枚作曲（林枚是有“歌仙”之称的作曲家陈歌辛的笔名）、范烟桥作词、周璇演唱的《夜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座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这是一幅描写灯红酒绿的不夜城——老上海的“音乐风俗画”，几十年来风行不衰，已成为上海的一首标志性歌曲。作为电影《长相思》的插曲，《夜上海》叙写的是旧上海舞女的夜生活。以上只是歌曲的第一段，第二段接下来写道：

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晓色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②

看来，上海不仅具有繁华、歌舞升平的一面，而且有着让人苦闷、烦恼的另一面。对于上海生活的这种两面性，电影《七重天》的

^①钱乃荣：《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载《海派文化发展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第三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陈钢主编：《上海老歌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插曲《天堂歌》(严华曲、徐卓呆词、周璇唱)有着更鲜明的对比:歌曲的第一段说的是“上海呀,本来是天堂,只有欢乐,没有悲伤”,可第二段说的却恰恰相反,“上海呀,本来非天堂,没有欢乐,只有悲伤”。这种对比,在由姚敏作曲、作词并演唱的《如此上海》这首歌中亦有着鲜明的表现:

摩登的 Miss And Gentleman, 个个都时髦华丽巧装扮。
萍水相逢一见恨太晚,愿我俩共结同心永相爱。高楼和大厦
还嫌住不惯,倒不如公寓旅馆少麻烦。每日里灯红酒绿常安
排,花几千用几百也不碍。谁知道遍地血泪哀号,穷困人家破
人亡,忍饥寒徘徊街头彷徨,生活凄惨流浪。暮烟漫漫满布大
上海,黑暗重重淹没大上海,有钱人挥金如土无忧烦,劳苦人
一生忙碌永不安!^①

这就是说,上海从来就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这听起来似乎颇为矛盾——不错,现代都市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性其实正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就探讨了这种“现代性”与“矛盾性”的关系。还是李天纲说得好:“都市里充满机会,所以有各种冒险、勤奋、创新和欺骗。都市里平凡冷漠,所以要寻求刺激、变化、理想和希望。和比较宁静的乡村生活相比,这都市生活方式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挑战,许多人视此为怪物,心情复杂。许多人很不适应,失落、怀旧及乡恋是普遍情绪。”^②也就是说,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们,由于生活里并不全是鲜花、掌声和黄金,所以许多人还有着一种解不开的乡土情结。与这种情结相伴随,海派

^①陈钢主编:《上海老歌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②李天纲:《“海派”近代市民文化之滥觞》,载《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都市流行歌曲在现代性之外,还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性。事实上,海派文化的现代性从来就不是彻底的,或者如李欧梵所说,那只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二)乡土情结与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传统性

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现代性之所以不是彻底的,与上海市民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有关。正是这种乡土情结,导致了海派都市流行歌曲的传统性。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关系略作梳理。

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发展和欧洲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就欧洲而言,城市犹如被落后的乡村所包围的“海中孤岛”,它们往往是文化的独占区和宗教的中心;而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周边的乡村基本上是合而为一的,尤其是文化和宗教场所,总是星罗棋布的,并不限于城市。美国学者施坚雅等人所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书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联为一体的。“直到十九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和鲜明的对照。甚至连作为城乡分界标志的城墙,也无法将城市和乡村隔绝开来。”^①对于造成传统中国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原因,卢汉超是这样解释的:首先,中国的精英阶层多为拥有土地的乡绅,他们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建立于乡村,而不在城市。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些精英阶层居住在城里,但他们都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乡村,他们保留着正式的住宅和“恒产”,如祖业、墓地和祠堂。总之,他们的根仍在乡村。其

^①(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次,中国的城市不像欧洲的城市那样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市政纪念物以及“市民”的概念,从而使其区别于周围的乡村。再次,中国的城镇与乡村之间保持着各种联系,人口双向流动,这使得城乡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难以产生城市优越感。不但没有优越感,中国的传统城市反而给人留下了一种“消极的形象”。在宋代以前,城市是占据优势的行政中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衙门、赋税、徭役、刑法和诉讼,它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成了让人敬畏的场所。宋代以后,城市的商业化特征并没有使人们头脑中的城市形象得以改善和提高。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的恶名声和固执的社会偏见反而增强了人们对城市的恐惧。^①也许,顾炎武的这段话是对传统城乡关系的最好概括:“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日知录》)

到了二十世纪,古老的价值体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传统的城乡一体化体系发生了断裂。“尽管对城市的种种疑虑在某种程度上仍挥之不去,但人们已开始认为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比乡村市镇要好。这一全面的重新评价主要来源于城市中经济机遇的显现。在二十世纪,乡村的衰败与城市的工业化并行,促成了城乡的分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②于是,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从而开始了他们的都市寻金梦。当然,“由于贫穷,他们无法享受一个现代化城市所提供的大部分便利,不得不容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但所有的艰难和伤害没能迫使他们离开城市。恰恰想反,他们

^①(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②(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